

论政治人理性

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

刘志伟 著

理
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政治人理性

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

刘志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政治人理性：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刘志伟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ISBN 7-5004-5400-7

I. 论… II. 刘… III. 政治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28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93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做一个站立起来的“大写人”

(自序)

平生酷爱读书，我以为“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简陋的居室里，四处或立或卧的书籍成为最触目的景观。这或许是童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读了太多的“红宝书”，看不到其他“封资修”书籍，患了严重的“书籍饥渴症”，余生需要“恶补”读书。实际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论政治人理性——从“经济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正是我四年多时间里苦读、苦思的“结晶”。自1999年底始，为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生，按照导师开列的书目，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学书籍，做了近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摘记。2002年初，学位课程结束后，在准备和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我又阅读了大量书籍，再次留下了二三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摘记。四年多来，尽管失去了许多夜晚的安眠和节假日的游乐，然而，我在苦读、苦思过程中心灵深处所感受到的充实、愉悦乃至崇高，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慰！

1999年底，在人类社会即将跨入新世纪、新千年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中国也已站在了WTO的门口，面对新世纪、新千年的机遇与挑战，满怀对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民族强者之林的强烈期待，我深切地感到：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加紧迫地进一步推向前进。正是这种迫切感，成为我年逾不惑之时，全身心投奔燕园求学的巨大动力。记得

2002年5月，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召开的“入世与中国政府应对”研讨会上，曾听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说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中国的“改革”放在了一个体制性的平台上；而加入WTO，又将中国的“开放”放在了又一个体制性的平台上。至此，我们才能说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全面地纳入了体制性的轨道，有了制度的保障，从而真正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林教授“两个体制性平台”的观点，我颇为赞同，认为它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深远历史意义。但同时，我想指出两点：其一，无论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加入WTO”，其最直接接触的社会域面还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并未真正触及政治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依然任重而道远。其二，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经百余年丧权辱国、20世纪里又历经二十余年纷纭内战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大国实现了现代化，周边国家也纷纷开始了经济起飞，在这样一种内外因素的强烈刺激下，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已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谁也不可阻挡的潮流，当代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使之发生根本逆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担心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否能够“逆转”，而在于中国的政治家们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一潮流，又如何顺势而为，加速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早日实现中国社会由自然经济形态向现代工业形态、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如今，人们有这样一种共识：目前中国实现的社会改革，一方面社会经济改革并未触及其核心问题——产权制度的改革，另

一方面社会政治改革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改革。问题是，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社会腐败的滋生蔓延、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日益严重的种种社会弊端都直逼这样一个严肃的追问：如何全面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经济改革，如何加快推进以政治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改革？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且不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物流、人流、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运动，都不断冲击着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体制，使我们再也不能固守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此，我想着重强调一个社会学、人口学的事实：当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所谓“新生代”、“新新人”、“八〇后”……当他们源源不断地步入成年，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人口主流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无论主动也罢，或是被动也罢，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他们、容纳他们，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不可再有任何延宕的一个紧迫课题。

因此，关切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正是我攻读北京大学博士学位，乃至思考和撰写这部博士论文的基本动因。我的博士论文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通过人性分析，从政治人行为理性与经济人行为理性比较分析的角度，试图厘清政治人行为理性的“应然状态”。这种分析和探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论政治人行为理性的分析，还是经济人行为理性的分析，我都坚持了人的自利性“一元观”，强调社会应当全面承认人的利益，国家应当全力维护人的利益，公民也应当坚定地主张自己的利益，从而力图为“大写人”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点；二是通过对政治人行为理性“应然状态”的分析，并向政治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延伸，就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公民的关系、权力的合法获得与合法使用、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阐

述了我的观点，进而力图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着力点提供理论支持和思考路径。

自由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追求。所以，人们说“不自由，毋宁死”。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1999年出版的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提出了“实质（substantive）自由”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实质自由”，就是指人们在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疾苦（例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的能力，同时，也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有关“实质自由”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自由”的完整内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人类社会总是在追求物质生活自由的同时，还坚定不移地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倘若人类仅仅只有物质生活的自由，没有精神生活的自由，那么，人类社会就至今也走不出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洞”。倘若人的权利仅仅局限于“生存”，那么，人就无异于禁锢在饲养场里的猪。毫无疑问，物质生活的自由和精神生活的自由都是“人之为人”不可分割的前提。所以，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人们固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然而，不管人们怀有多少不同的期待，在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争取获得愈来愈多精神生活的自由，无疑成为人们共同的期待。

有人说，自由可以区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那么，就言论自由来讲，所谓“积极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说不”的自由，而“消极的自由”则是人们可以“不说”的自由。我认为，还应该加上“建设的自由”，也就是人们可以“说是”的自由，即人们对于如何构建一个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

的社会，能够“自由”地阐述其建设性的意见，人们不会因此有“人微言轻”的感受，更不会因此有遭受人身迫害的恐怖。无论上述哪一种自由，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每个人都必须首先双脚站立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写人”！一个四肢匍伏在地的“人”，就不能、不会、也不敢坚定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不能、不会、也不敢公开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就不能、不会、也不敢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一句话，一个对威权顶礼膜拜以至于丧失了自我的“人”，也就既不可能“说不”，也不懂得“不说”，更不知道“说是”。

本部著作基本保持了 my 的博士论文原貌，在出版时仅对个别章节进行了少量修改。受论文选题、理论范式、阐述角度和行文风格等影响，许多有关中国社会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只能在理论层面上有所触及，且往往是“点到为止”，就此说明。同时，我也热切地期待与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我的电子邮箱是：zwliu@gwamcc.com。

在本部著作出版之际，我还想再次对我在论文撰写、答辩期间给予巨大鼓励、支持和帮助的诸位先生：谢庆奎（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北京大学教授）、徐湘林（北京大学教授）、黄恒学（北京大学教授）、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景跃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在本部著作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罗莉编辑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和职业精神，也使我的内心充满感激。

2005 年秋于北京丰台破壁斋

论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旨是针对当前学界一些学者试图以“经济人理性”假设取代“政治人理性”假设，即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理性殖民”的现象，运用比较分析的理论框架，从经济和政治行为主体的视角，分别阐述了“政治人理性”和“经济人理性”的内涵，指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学理上的主要错误，揭示了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这两种行为理性的主要比较差异。同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在核心范畴和价值追求方面的比较差异；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政治学和经济学从“古典”到“当代”主要发展和变革，以及这些发展、变革对于经济学与政治学基本学理的影响进行了宏观概括和总体评述；运用“应然分析”和“实然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学理上的根本错误。本研究在比较分析“政治人理性”和“经济人理性”的过程中，还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权力的合法获得与合法使用”和“效率与公平的抉择”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作者的见解。

关键词：行为主体 比较分析 政治人理性 经济人理性

目 录

导论	(1)
一 问题提出:人的多样性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1)
二 主要概念:理性、经济人理性和政治人理性	(5)
三 分析视角与分析方法:行为主体分析的视角 和比较分析的方法	(12)
四 基本思路:概念分析、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和 历史演变	(16)
第一章 经济人理性:从“斯密问题”到恩格斯的 “恶欲说”	(19)
第一节 解读“斯密问题”:从德国历史学派到 阿马蒂亚·森	(19)
一 德国历史学派:“自利论”与“利他论”的 对立观	(19)
二 阿马蒂亚·森:“自利论”与“利他论”的 二元观	(21)
三 亚当·斯密:人性基本假设“自利论”的 一元观	(24)
第二节 经济人理性:自利行为、市场行为、价值 理性行为	(32)

一 自利行为:自利性与自私性.....	(32)
二 市场行为:市场性与非市场性.....	(36)
三 理性行为:理性与非理性.....	(42)
第三节 “恶欲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人理性”评价的再解读.....	(48)
第二章 政治人理性:权力分析与利益分析.....	(53)
第一节 追问“权力”:权力的内涵与权力的结构.....	(53)
一 权力的内涵:是意志? 还是利益?	(53)
二 权力与权威:权力主体的两种影响力.....	(57)
第二节 政治人理性:自利行为、社会公共性行为、工具理性行为	(61)
一 特征:以满足精神需要为主要特征的自利行为.....	(61)
二 特征:社会公共性行为.....	(70)
三 特征:政治行为主体的工具理性.....	(77)
第三章 比较分析:政治人理性的经济学误读.....	(86)
第一节 双重疑惑:经济人理性的单一化和外衍化.....	(86)
一 单一化:经济人理性 \neq 人的自利性	(86)
二 外衍化:经济人理性 \neq 政治人理性	(88)
第二节 五重比较分析:经济人理性与政治人理性的区别	(91)
一 比较分析: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	(91)
二 比较分析:平等与不平等.....	(99)
三 比较分析:均衡与非均衡	(105)
四 比较分析: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	(113)
五 比较分析:私法与公法	(119)

第四章 制度分析:两种制度的核心范畴和两种理性的价值追求	(122)
第一节 制度分析:从凡勃伦、康芒斯到加尔布雷思、诺思	(123)
一 内涵与意蕴:制度主义的新旧变迁	(123)
二 两种安排: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130)
三 社会秩序的基础:制度的巨大作用	(132)
第二节 制度分析: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核心范畴的比较	(137)
一 科斯定理:“产权”是经济制度的核心范畴	(137)
二 “阿克顿定律”:“权力”是政治制度的核心范畴.....	(143)
第三节 制度分析:政治人理性与经济人理性价值追求的比较	(157)
一 比较分析:“效率”的价值追求	(158)
二 比较分析:“公平”的价值追求	(160)
三 比较分析:“效率”与“公平”的抉择	(162)
第五章 历史演变:后古典时期的政治人理性与经济人理性	(169)
第一节 发展与变革:经济学从“古典”到“当代”	(170)
一 从“追逐物欲”到“人文关怀”.....	(171)
二 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177)
第二节 发展与变革:政治学从“古典”到“当代”	(181)
一 从“追逐权力”到“寻求善治”.....	(182)
二 从“完全主权”到“受限主权”.....	(193)

第三节 不变的学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当代回应	(201)
一 现象与本质:“变”与“不变”的分析	(201)
二 “休谟的铡刀”:应然分析与实然分析	(204)
结论.....	(208)
参考文献.....	(220)
感谢生活:回首漫漫来时路(代后记)	(232)

导 论

一 问题提出：人的多样性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认识你自己”，这是数千年前先哲们铭刻在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特尔斐神殿上的文字，也是一句永远为人类奋力前行指明方向的箴言。被西方学术界视为 20 世纪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其《人论》开篇的第一段话就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① 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与人性的认识，对人与人性的解读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人与人性的解读，也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依据。毫无疑问，从政治学角度对人与人性的解读不仅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而且也是政治学得以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根本依据。

人类现实社会中人与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人类对人与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人性问题认识的无限丰富性。然而，无限丰富的人与人性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永远无法正确地认识它。我们是“世界可知论”者，人类社会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不断破解着人与人性问题的无穷奥秘，逐渐接近着对人与人性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面对无限丰富的人与人性问题，人们采取了分类的方法进行解读。正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面对大自然恒河沙数一般众多的树叶，植物学删繁就简，将其仅仅分为两类——“针叶”与“阔叶”。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也对人与人性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分类。传统的人性理论对人与人性采取了“两分法”，即对人与人性进行了“善”与“恶”的基本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则依据“人性冲动的理论”，对人与人性采取了“四分法”，即“政治性的冲动与政治人假设”、“经济性的冲动与经济人假设”、“道德性的冲动与道德人假设”、“审美与情感的冲动与审美人假设”，也就是说，毛寿龙教授将人类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性分类为“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和“审美人”。^①在此，我们姑且不谈如何对人与人性进行分类，例如是“五分”（譬如：“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审美人”和“宗教人”），抑或“六分”乃至更多。至少人类社会中与人性可以划分为“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和“审美人”，这是人们凭借经验即可确证的社会现实。然而，问题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自古典经济学提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之后，当代经济学界就有一些学者主张以“经济人理性”的基本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一切学科关于人与人性的

^① 2001年11月4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生会联合举办的第2次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报告。

基本假设。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1930—），在其发表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一书中就认为，“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①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而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②

对于学界以“经济人理性”的基本假设取代人类现实社会一切人与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反对者斥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当代美国金融界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1930—）则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③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与人性的基本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取消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关于人与人性问题的不同假设，无异于取消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存在的基本依据。因此，无论是从还人类现实社会人与人性问题多样性本来面目的角度，还

① [美]加里·S.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244页。

② 参见王振海：《公共职位论纲——政府职位的属性与配置机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③ 参见[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是从捍卫政治学学科独立性的角度，笔者认为，关于“政治人理性”的分析都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实际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也日益受到当代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学者王曙光就指出：“与经济学的渗透力日益扩张这一事实相应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经济学教科书所灌输给经济学学生的对于人性假设的固执的偏见，是影响经济学价值趋向的重要因素。”^①

美国当代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Adler, 1902—）曾经指出，哲学的事业就是要探索和澄清概念。他在对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六大观念进行分析和澄清时指出，正如其他一些我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一样，“在日常对话中，我们每个人都用到它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掌握它们的意思，而且，不少人没有能够有效地思考这每一个观念背后隐藏着的问题”。^② 在本书中，笔者也正是要指出，尽管人们在“日常对话中”不断使用“政治人理性”（Political Man's Rationality）或“经济人理性”（Economic Man's Rationality），但是，恰恰对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同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掌握它们的意思，而且，不少人没有能够有效地思考这每一个观念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这部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专著，笔者试图通过对“政治人理性”与“经济人理性”的比较分析，“探索

① 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第3页、第19—20页。

② [美]莫蒂默·阿德勒：《六大观念》，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